

外国作家 笔耕录

WAGUOZUOJIA
BIGENLU

王志斋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K815.6
J



王志斋



外国
作家
笔耕录

034126



女子学院 0012621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1987年·南昌



外国作家笔耕录

王志斋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625 插页0 字数15万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537

定价: 1.50元

ISBN 7—210—00032—1/I·12

目 录

批评家的天才之作·····	(11)
他是一员勇士·····	(12)
大作家的控诉信·····	(13)
在丑恶的现实面前·····	(14)
和作品同命运的大诗人·····	(15)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胸怀·····	(16)
艰难的第一步·····	(17)
生前忧患死后凄凉的作家·····	(18)
堪称楷模的盲人作家·····	(19)
不能听从的劝告·····	(20)
鲜明的印记·····	(21)
一个流亡者的结局·····	(22)
真正的酬报·····	(23)
为一场大战作证的小说·····	(24)
号角与导火线·····	(25)
一部小说产生了一条法令·····	(26)
在天才出现之前·····	(27)

19世纪俄国文坛的伯乐·····	(56)
文坛泰斗如是说·····	(61)
司汤达生前的知音·····	(66)
难忘的伊豆舞女·····	(69)
生活中难忘的人物·····	(71)
屠格涅夫的少女·····	(74)
并非“恶作剧”·····	(77)
一种有趣的习题·····	(80)
生活的馈赠·····	(84)
作家的形象积累·····	(87)
是生活造就了她·····	(90)
狄更斯最得宠的孩子·····	(92)
“笔杆接近不了的啊!”·····	(94)
发人深省的悲剧·····	(97)
作家的第二天性·····	(101)
人的秘密的探索者·····	(104)
培养观察力的独特途径·····	(107)
叹为观止的观察家·····	(111)
博古通今的文学大家·····	(115)
鹅掌草的香气及其它·····	(120)
作家与想象·····	(123)

且说联想·····	(126)
从莫泊桑拂袖而去说起·····	(130)
应当发展的素质·····	(134)
文贵有情·····	(137)
热爱祖国语言的屠格涅夫·····	(140)
老校对回天有术·····	(142)
诗歌语言的锤炼与锲的开采·····	(145)
“一语说”的实践者·····	(147)
他使一种古老语言得以复苏·····	(150)
不可违逆的规律·····	(152)
未曾成功的尝试·····	(155)
一部不无遗憾之作·····	(158)
人物命运的选择·····	(161)
一个巨人形象的诞生·····	(164)
题材获得之后·····	(167)
并非易事·····	(172)
重要的是自己的发现·····	(176)
只有开头和结尾的小说·····	(179)
宝贵的启示·····	(181)
细微末节之类·····	(185)
这不是“小题大作”·····	(189)
冰山理论的启示·····	(192)

谜一样的写作顺序·····	(196)
用勤奋培育出来的天才·····	(199)
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·····	(203)
霞尼古勒的启示·····	(206)
为作家所看重的“一刹那”·····	(210)
“脱离窘境的他正是他”·····	(213)
英国诗坛三巨星的碑文·····	(217)
碑文续谈·····	(221)
席勒与《欢乐颂》·····	(226)
监狱中诞生的处女作·····	(229)
失踪之后·····	(232)
自封为国王的小说家·····	(235)
后 记·····	(238)

批评家的天才之作

1847年7月，身患重病的别林斯基来到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鲁恩疗养。在这之前，他已读到了出版不久的果戈理《与友人书信选集》。在这本书中，这位曾被别林斯基热爱过、并高度评价为真正的人民作家、最伟大的俄国诗人，却一反常态，转而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和虔敬，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，甚至懊悔地说，他过去所写的一切，都是毫无益处的。这本书反映了果戈理深刻的精神危机，这是他长期侨居国外、脱离俄国先进的社会运动，脱离俄国进步文艺界，在反动文人包围下，思想向右转的结果。《与友人书信选集》出版之后，在俄国先进人士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遭到愤怒的谴责。这封信也大大激怒了别林斯基，他称这本书是“卑鄙的书，无耻之徒的卑鄙”，“精心玩弄的卑鄙”。他当即在《现代人》杂志上撰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进一步指出这本书是果戈理的堕落和艺术上的衰退，它的作者是“恭顺的忠告者”。别林斯基的文章使果戈理深感，他与别林斯基的友谊已面临决裂的边缘，他将失去这位在俄国文坛有着举足轻重地位和巨大影响、过去曾大力支持过他的批评家。这对果戈理来说，当然是不情愿的。他怀着一种十分“委曲”的心情给别林斯

基写了一封信，作了种种解释，以求取得别林斯基的谅解。他说：“我痛心地读到您写的那篇论及我的文章，……使我伤心的，并不是因为您想要在所有的人面前加给我的那种羞辱，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听见了一个恼怒我的人的声音。但是我并不想得罪任何人，哪怕是不爱我的人，当然更不用说得罪您这个我一直认为爱着我的人了。我并没有想要在我的书的任何地方伤害您。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俄国每一个人都生在生的气，这一点我本人至今仍不明白……我以为……在我的书里有的是普遍和解的幼苗，而不是纷争的萌芽。”

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疗养地收到果戈理的这封信。他并没有被果戈理的花言巧语所迷惑。他不相信果戈理的诚意。在他看来果戈理决不是一时陷入迷途，如果是这样，尚可宽容，而对于卑鄙，这就不能容忍。别林斯基把果戈理的回信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行为，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挑战，这是一个俄国在向另一个俄国的挑战。别林斯基坚决地回敬了这位挑战者：“我倒是想眯起眼睛，尽情倾泻我的愤恨和怒火”，他抱着重病，伏案三天，写成了那封著名的不朽信件：《给果戈理的一封信》。在这封信里，别林斯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，从维护真理、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出发，对《与友人书信选集》的反动观点，再次进行了严厉的无情的批判。别林斯基写道：“一位伟大的作家，曾经藉优美绝伦、无限真诚的作品，如此强烈地促进俄国的自觉，使他能够象在镜子里一样地看到自己，——这位作家，现在却出版了这样一本

书，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，教导野蛮的地主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，更厉害地辱骂他们……这难道不会叫我愤怒吗？”个人“自尊心受到凌辱，还可以忍受，……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，是不能忍受的，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，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，是不能缄默的。”“这不是我或您的人格问题，而是不仅比我，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：这是关于真理，关于俄国社会、关于俄国的问题。”

《给果戈理的一封信》表达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为真理、为祖国、为人民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崇高品格。它在俄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，就是今天来读它，也能给我们无穷的启示。1914年列宁在《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》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它，认为“别林斯基那篇总结了他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《给果戈理的一封信》，是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”。赫尔岑则认为“这是一篇天才之作，而且似乎就是他的遗嘱”，因为别林斯基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不到一年，就与世长辞了。

他是一员勇士

在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，亚历山大·大仲马是位声名显赫的人物。他是一位戏剧家，又是一位小说家。作为戏剧家，他以《亨利第三及其宫廷》初登文坛，在法国文学史上打出了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斗争的第一枪。作为法国剧坛上第一位浪漫主义明星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他其后的许多剧作，例如《克里斯蒂娜》、《安东尼》等，也都名噪一时；作为小说家，他的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度山伯爵》、《蒙梭罗夫人》等，也为人们所熟知。他的创作十分丰富。据说，他一生共创作剧本近90部，小说150部，计300卷。这个产量是十分惊人的，在世界文学史上比他更多产的作家恐怕也是不多的。虽然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之作，但那些优秀作品，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。

除了作为文学家以外，大仲马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员勇士。这一点人们似乎还知之不多。

1830年7月26日，查理十世颁布了五条敕令，废除立宪政体，加强专制统治。本来对他已积压太多不满的法国人民，这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7月27日，巴黎人民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，这就是史称推翻波旁

王朝的“七月革命”。在这一次革命中，大仲马是一个最活跃、最积极的参加者。他身穿猎装，几乎出现在所有斗争的重要场合，在枪林弹雨的街垒战中，他和那些起义者始终战斗在一起，向复辟王朝发起一次次进攻。当革命需要弹药之时，大仲马欣然请命，凭着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大智大勇，单枪匹马闯进复辟王朝的城防司令部。在处于一对三的劣势下，他双手举枪，硬是迫使那个顽固的司令官妥协下来，交出了弹药，为七月革命的胜利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大仲马成了七月革命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。

七月革命的胜利成果，后来却被一小撮金融资产阶级所篡夺，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·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。他一上台，就背叛了七月革命中的真正英雄——工人阶级，使他们重新备受奴役与排戏。篡权者们甚至否认有过革命，认为只是王位的更替而已。劳动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他们的反动面目。一场新的革命又在酝酿着。大仲马原是奥尔良公爵属下的图书馆一名馆员。他对七月王朝的一切倒行逆施十分不满，便毅然辞去了这个清闲而待遇优厚的职务，他声称：“作为文学家的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，”“对信仰的忠诚先于对个人的忠诚。”他对人民的愤懑情绪了如指掌。对于不可避免的、即将到来的革命深有预感。1847年8月，在他创作的历史话剧《红屋骑士》中，他借了剧中革命的吉伦特人之口，唱出了当时法国人民的心声：

通过告警的炮声

法兰西在召唤她的儿女！

走！士兵说，拿起武器，

去保卫我们的母亲。

为祖国而献身，

最美好，最值得庆幸。

朋友们，我们远离沙场

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，

那么为法兰西和她的自由，

至少要献出我们的葬礼！

为祖国而献身，

最美好，最值得庆幸。

这首歌，在话剧演出之后，立即传遍了巴黎的街头巷尾，甚至军乐队也演奏它的乐曲，它和当时的革命气氛十分合拍。这就为1848年2月革命大造了舆论。

在1848年2月革命中，这位年届46岁的大作家，其热情不减当年。他身穿军装（1831年他曾当过炮兵连副连长），率领着一支自卫军，又一次活跃在起义者的行列中，在攻打七月王朝最后一个堡垒——土伊勒里王宫的战斗中，大仲马率领的这支军队始终战斗在最前列，为二月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甚至到了晚年，大仲马这种热情依然十分高涨。1860年到1863年3年多的时间内，他又投身于意大利加里波的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。他不仅捐献了自己所剩的全部稿

酬，还欣然受命为加里波的的义勇军购买了大批枪支，为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这样一位热情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家，他在文学上成为向为君主专制辩护的古典主义作斗争的勇士，也就一点也不奇怪的了。

大作家的控诉信

左拉是列宁最喜爱的法国作家之一，曾称他是“一位难得的耿直与勇敢的作家”。他的耿直与勇敢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。1894年有个叫德雷福斯的犹太血统的法国下级军官，被指控犯有泄露军事机密的“叛国罪”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后来经过法国参议院副议长休雷—凯斯特奈的调查，证明犯有叛国罪的并不是德雷福斯，而是另一名奥国籍军官。但德国反动政界、军界、司法界为了藉德雷福斯事件达到排犹的目的，进而打击进步力量，却对真正的叛国者不予治罪，无辜者仍然被关在监狱。

其时，左拉正在他的别墅里埋头创作长篇小说《巴黎》。有一次，他在另一位法国作家都德家里听人们议论起这个案件，他就清楚地看出，这是一起冤案。特别是后来反动分子的这种颠倒是非、为所欲为、践踏人权的嚣张气焰，大大激怒了他，使他无法再呆在平静的书斋，决心为无辜者伸张正义。为此，他毅然放下正在创作的小说，打破每天平均写3页的惯例，走向社会，对德雷福斯事件进行了广泛、周密的调查，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材料。这些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，德雷福斯是无罪的。为了揭穿事实真相、为无辜者辩白，这位“耿直与勇

敢”的作家，接连写了《告青年书》、《告法国书》，向法国社会发出了主持公道的呼吁，同时他又以十分激愤的心情，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这就是名垂史册的《我控诉》。此信发表在《震旦报》上。左拉深知，在右派势力当权的情况下，公开信的发表，将会使他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但是为了伸张正义，坚持真理，他已把自己的利益和安危置之度外了。在这封公开信中左拉写道：

我控诉巴底·德·克朗中校，他作了魔鬼的工匠，制造出这场司法上的错误判断。

我控诉麦尔西埃将军，他成了本世纪最大一件冤案的同谋犯……

我控诉比奥将军……他犯了违反人道、违反正义的罪行。

我控诉瓦德弗将军和贡斯将军，他们作了这一罪行的同谋犯……

我控诉贝利欧将军和拉瓦利司令，他们作假调查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

我控诉伯洛姆，瓦利纳和谷瓦尔三个书法专家，他们的报告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谎言。

我控诉国防部长，他在各报上……进行无耻宣传，混淆是非，掩盖错误。

我控诉军事法庭第一庭侵犯人权……

信的结尾，这位大义凛然的作家写道：

我的行动纯粹是一种革命手段，目的在于使真相和正义早日大白于世。

人类已经忍受了过多的痛苦，人类有权要求幸福。我只有一股热情，那就是为人类寻求光明。我的愤怒的抗议是发自内心的呼声。让他们把我送去受审吧，但愿审讯在完全公开情况下进行。我等着。

这封信发表之后，立即轰动整个欧洲，在法国国内，其反响尤为强烈。许多知名人士都联名请愿支持左拉，广大普通群众更把左拉看作是他们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。人们到处呼喊着“我控诉”的口号，到处张贴着“我控诉”的标语，这对左拉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持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右派势力大为惊恐。为了加害于左拉，又故伎重演，给他罗织了一个“卖国贼”的罪名，扬言要对他进行“严惩”。不久法院果然以“诬告罪”传讯左拉。在法庭上，这位不畏强暴，随时准备为真理、为正义而斗争的作家，再一次慷慨陈词，表明自己不可改变的立场。但是，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的法庭，毫无公理可讲，最后还是以“诬告罪”判处左拉一年徒刑，罚款3000法郎，他们还唆使一些无耻之徒欲对左拉进行陷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朋友都替左拉的安危担心，劝他出走。左拉只好于1898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，直到1899年法国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，左拉才返回祖国。

这就是一位伟大作家在强暴面前，不畏邪恶、为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崇高品格，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的榜样。